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夏晓虹
编

金天翮
秋瑾
吕碧城
何震
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夏晓虹
编

金天翮
秋瑾

吕碧城
何震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金天翻吕碧城秋瑾何震卷/夏晓虹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686-8

I. ①中… II. ①夏…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金天翻 (1873~1947)-思想评论③吕碧城 (1883~1943)-思想评论④秋瑾 (1875~1907)-思想评论⑤何震 (1886~?) -思想评论 IV. ①B25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8170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金天翻、吕碧城、秋瑾、何震卷

夏晓虹 编

Jin Tianhe Lü Bicheng Qiu Jin He Zhe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6. 2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0 000	定 价	45. 00 元

040850210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 主 编 戴 逸
-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言

本册是多人合卷，其共同的交点，即为晚清的妇女论述。因此，很明显，选入本卷的文章都关切这一主题，并不以呈现各人思想全貌为目标。而相关论著的时段仅限于晚清，则是由于在编者看来，晚清实为中国近代女权思想的发轫期，各种相关问题的讨论已相当活跃，并开启了此后无数论说与实践的先声。回到思想的原点，本编选取了在晚清妇女论述中最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四位思想者——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与何震——的文章编为一集，希望能够为读者返回历史现场提供帮助。

金天翮的“女权革命”论

金天翮（1873—1947），原名懋基，后改名天羽，字松岑，号鹤望、鹤舫，别署爱自由者、金一、天放楼主人，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人。金氏早年也曾考科举，但于研习旧学时，亦关注新学。1899年，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三年。^① 1902年，在同里创办新式学校同川学堂。^② 次年，因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蔡招金前往，任会计。金因此常常往来两地，便在家乡组建了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③，并于是年加入兴中会。其革命思想，也以这几年最为高昂。1903年，先后出版

① 参见吴新雷：《南菁书院的学术研究及其对文化界的贡献》，载《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22页。

② 参见赵承祖：《同川学堂与中国教育会》，见《吴江文史资料》，第16辑，112页，政协吴江市委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印，1998。

③ 参见金天羽：《蔡冷民传》，见《天放楼诗文集》下册，10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柳亚子：《五十七年》，见《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149、1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女界钟》及所译宫崎寅藏自述参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与薛凤昌合作），并为留日学生刊物《江苏》撰稿，作《孽海花》小说前六回。1904年，刊行了据日本烟山专太郎《近世无政府主义》译述的《自由血》。同年，又在同里创办明华女学校。入民国，历任江苏省议员、吴江县教育局局长、江南水利局局长、安徽通志馆编纂。1932年，在苏州参与组织国学会，与章太炎共同讲学。1936年，《皖志列传稿》印行。抗战初期，应聘为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41年上海沦陷后，返回苏州，于1947年1月病逝。^①著有诗文集多种，近年辑为《天放楼诗文集》出版。

《女界钟》是金天翻1903年6月底因“《苏报》案”发，从上海归乡后，“伤政党之憔悴，痛女界之沦胥”，“竭四星期之力”^②完成的论著。此书作者署名“爱自由者金一”，卷首有林宗素、黄钧（菱舫）与杨锡纶（纫兰）三位女士所撰序，末有柳亚子写于“癸卯闰五月”的《后叙》。今可见两种早期版本，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上海爱国女学校发行的初版，以及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再版。由此也可窥见此书的写作背景。

爱国女学校由中国教育会于1902年10月创办于上海。^③蒋智由任经理（即校长），不久因其赴日，会长蔡元培接任掌校。6月15日，蔡去青岛，两周后发生“《苏报》案”，章太炎遭拘捕，邹容投案。连带受影响的还有1902年5月在上海复刊的《女报》（1903年3月第2年第1期起改名《女学报》），主编陈撷芬为《苏报》主人陈范之女，因此亦随父逃亡日本。该报虽在陈撷芬到达东京后，10月间勉力再出一期，但也就是尾声了。^④林宗素为《女界钟》作叙，署记为“癸卯六月”“叙于沪读《女学报》馆”^⑤，应已是《女学报》即将在国内结束的日子。而金天翻写作之际，爱国女学校尚前途莫测，自然也让金氏忧心。幸好，该校终能坚持下来，《女界钟》初版即以之作为总发行所。并且，

① 民国后经历主要参考杨友仁：《金松岑先生行年与著作简谱》，见金天翻：《女界钟》，108~14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② 柳人权（柳亚子）：《后叙》，见金一：《女界钟》，95页，1904年再版。以下《女界钟》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注。

③ 参见宋培基、钱斌：《爱国女学成立时间考辨》，载《史林》，2006年第3期，77页。

④ 参见夏晓虹：《晚清两份〈女学报〉的前世今生》，载《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1期，28~32页。

⑤ 林宗素：《侯官林女士叙》，见《女界钟》，3页。

1904年1月，丁祖荫（号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也在上海创行，此刊显然以接续《女学报》在国内的事业为己任，其创办得到了金天翻的大力支持，发刊词即由金撰写。^①

在《女界钟》写作之前，可供作者汲引的相关女权思想资源，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种：1901年4月7日，吴孟班（名长姬）在上海《中外日报》发表《拟上海女学会说》；1902年11月，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与《达尔文物竞篇》合为一册，由少年中国学会出版；1903年2月，上海广智书局发行赵必振译、日本岩崎徂堂与三上寄凤〔风〕合著之《世界十二女杰》；大约3月，又有未署名作者编译的《世界十女杰》在日本出现^②；同年4月，马君武接力在梁启超于横滨主编的《新民丛报》第30号刊出《弥勒约翰之学说》第二节《女权说》，专门介绍了弥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女人压制论》（*The Subjection of Women*，今译为《论妇女的从属地位》）与社会党人的《女权宣言书》。这些论说与译述的精华，都及时在《女界钟》得到运用。

《女界钟》的写作宗旨，在本为金天翻弟子、而谊兼师友的柳亚子所撰《后叙》中有明白揭示。柳转述“同志金君”之言曰：“此书内容，实含有 Revolution 之思想。”故在文末，柳亚子即着意称许：“金君之书，其女界黑暗狱之光线乎！其女界革命军之前驱乎！其女界爆裂丸之引电乎！”^③ 确信《女界钟》具有引发中国女界颠覆黑暗现实的革命意义。

其实，金天翻的“革命”思想，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女权革命”。这体现在他对新世纪总体趋势的判定上：

十八、十九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④

尽管这个说法其来有自，日本新闻记者石川半山（名安次郎，1872—

^① 金天翻与《女子世界》的关系，可参看夏晓虹：《晚清女报的性别观照——〈女子世界〉研究》，初刊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收入个人专著《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67~1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② 据周作人癸卯三月十二日（1903年4月9日）日记：该日收到鲁迅“日本初五日函”，内开托人带来之书目，中有《世界十女杰》一册（鲁迅博物馆编：《周作人日记》，383~384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③ 柳人权：《后叙》，见《女界钟》，95、96~97页。

^④ 金一：《女界钟》第六节“女子之权利”，56页。

1925) 1900年经由《清议报》的翻译,已将“男女之竞争,创于十九周年……实为二十周年一大关键也”^①的意识传入中国;随后,吴孟班也根据“十九世纪之文明进化者,女权增进之世界也”的迹象,而预言“女权女学”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崛起的表征^②。但《女界钟》的凸显“革命”,仍是其特出处。比较受其影响的柳亚子复述的“西哲有言:十九世纪民权时代,二十世纪其女权时代乎”^③,已分明可见。

金天翻强调“女权革命”,乃是因为在他看来,“女权之剥削,则半自野蛮时代圣贤之垂训,半由专制世界君主之立法使然,然而终不可以向圣贤君主之手乞而得焉”。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出手腕,并死力以争已失之利权,不得则宁牺牲平和,以进于激烈之现象。”所以,他对“二十世纪女权革命之时代”的解说,正包含了暴力手段不可避免的含义:“夫欲求平和之权利,是欲诞育佳儿,而避分娩拆副之苦痛也,可乎哉?”^④而金氏毅然以提倡“女权革命”自任,正体现出其卓识与魄力。

《女界钟》全书因而是围绕“女权革命”展开论述。开篇的“小引”揭示其著述缘起,首先渲染欧洲白色人种快乐、自由的生活状态,而指认,此乃“十八、十九两世纪之间”,经历“十数革命大活剧”,争得“人人有自由权,人人归于平等”的结果。若追溯思想的根源,则“今日欧洲庄严璀璨、茶火锦绣之新世界”,实拜卢梭、福禄特尔(伏尔泰)、黑智尔(黑格尔)、约翰·弥勒、赫胥黎、斯宾塞等人学说之赐。如今这些学术思想“汽船满载,掠太平洋而东,至于中国”,男子已受其刺激,开始觉醒。金天翻因此发愿著《女界钟》,以使中国女同胞获闻“文明国自由民”之“男女平权,女子参与政治之说”^⑤。

接下来的“绪论”,其思路也是由欧洲至中国。在欧洲,“女权之说,虽有弥勒约翰、斯宾塞之徒昌之”,“欧洲妇人,业已自出手腕,以与男子争已失之权利”,但学说尚遭反对,斗争亦未成功,不过,“女权之种子”已然落地发芽。很明显,《女界钟》此处的论说正是基于马君

① 石川半山:《论女权之渐盛》,载《清议报》,第48册,1900年6月,“时论译录”4~5页。

② 参见吴长姬:《拟上海女学会说》,载《中外日报》,1901年4月7日。

③ 倪寿芝:《黎里不缠足会缘起》,载《女子世界》,第3期,1904年3月,70页。此文实由柳亚子执笔。

④ 金一:《女界钟》第六节“女子之权利”,58、59~60页。

⑤ 金一:《女界钟·小引》,11~12页。

武的译介。而金天翻所谓“民权与女权，如蝉联跗萼而生，不可遏抑也”^①，既是源自马氏叙述约翰·弥勒女权说时所倡言，“欧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皆自“君民间”与“男女间”“二大革命来也”^②，却又加以推演，令两大革命发生关联。其说日后再由丁祖荫引申，完整地表述为：

虽然，女权与民权，为直接之关系，而非有离二之问题。……政治之革命，以争国民全体之自由；家庭之革命，以争国民个人之自由：其目的同。政治之革命，由君主法律直接之压制而起；女子家庭之革命，由君主法律间接之压制而起：其原因同。^③

因此，女权革命实为民权革命的基础，应优先进行。

不过，金天翻其时在《女界钟》提出民权与女权相关性的话头，用意只在引出女子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国家由国民构成，而女性于其中的身份，则被特别标举为“国民之母”。其间自然有出于女性生殖能力的考量，但金氏对西方遗传学的兴趣，在此也起了作用：“夫个人之品性，虽由外界之风俗境遇，熏染刺激而化，亦自因内界之数十代遗传根性，酝酿陶铸而成。而根性之传，必离母以附子，阳施阴受，顿渐各殊。故国民无师，其所师则女子也。”^④ 尽管“女子为国民之母”之说导源于日本，而其言进入晚清语境，却显示出巨大的能量。金天翻嗣后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中重复此论，便顺理成章地指出：

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⑤

女性的命运决定了中国的前途，这才是妇女议题重要性的根本所在，也是由金天翻开启的“女子者，国民之母也”的命题此后不断在晚清回荡的原因。

既然女性为国民之母，企望其能“诞出新中国新人物”，“张女界之

① 金一：《女界钟》第一节“绪论”，12、13页。

② 马君武：《弥勒约翰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30号，1903年4月，9页。

③ 初我（丁祖荫）：《女子家庭革命说》，载《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4月，2页。

④ 金一：《女界钟》第一节“绪论”，13~14页。

⑤ 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载《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1页。

革命军”，“以唤醒深闺之妖梦”^①，则其人首先必定应为“新国民”。于是，中国的“女权革命”论述，在《女界钟》里，即具体落实为如何把身为“国民之母”的女性铸造成“新国民”的方法与步骤，而其关注的中心仍为女性的各种权利。并且，无论哪一种权利的获得，都是以自由反抗压制的结果。所谓“权利者，伴自由而生者也”，“压制去而后文明国自由民，出现于中国”^②。这一过程，自然也充满了“革命”的意味。

按照马君武的概括，欧洲社会党人主张的女权包含五项内容，即教育权、经济权、政治权、婚姻权与人民权（即公民权）。^③出于晚清中国的现实，《女界钟》对此有所变通。第六节“女子之权利”中，将“今日女子应当恢复之权利”列举为六项，即“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与“婚姻自由之权利”。其中第一项即教育权，第三、四项即经济权，最后一项即婚姻权。此外，所言“交友之权利”与“出入自由之权利”，纯属限于中国国情的特别应对之道，实际指向人身自由权，这原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此六种权利，在欧洲女性为已然拥有，金天翻也认为中国女子“其可必得无疑也”，而且有可能以“无革命之苦痛”得到，否则将“以剑继之”^④。在此之外，《女界钟》又另立“女子参预政治”之专节，针对欧洲女性尚未获得的政治权与公民权在中国实现的前景作出推断。此权利之获得显然困难得多，将“绞以脑，卷以舌，达以笔”，“溅以泪”，“迸以血”，最终“血溢而助以剑，剑穷而持赠以爆裂丸与低列毒炮”，即非以“破坏之事”行之不可，却又是“为我同胞争权利、夺自由之灵咒也”^⑤。

从全书章目看，除第七节专论女子参政权，第八节“婚姻进化论”专述女子婚姻权，留给教育权的，似乎只有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最切题。但统观各篇，不难窥见，女子教育实为《女界钟》最关注的话题，各节所论都与之相关。如第二节论“女子之道德”，认为：“夫世界文明进步，则女子之教育，亦将随男子而异。读书入学、交友游历，皆女子所以长智识、增道德之具也。”第三节“女子之品性”，讨论女性受

① 金一：《女界钟》第一节“绪论”，14~15页。

② 金一：《女界钟》第六节“女子之权利”、第三节“女子之品性”，63、30页。

③ 参见马君武：《弥勒约翰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30号，13~14页。

④ 金一：《女界钟》第六节“女子之权利”，60~63页。

⑤ 金一：《女界钟》第七节“女子参预政治”，74~75页。

社会习俗影响而形成的群体风气与品格，所指斥的“缠足”、“装饰”、“迷信”与“拘束”四大障害，皆因“束缚于旧风气”而造成；同时又认定：“夫跳出旧风气，以改造新风气，则莫如游学欧美矣。”至于第四节金氏对“女子之能力”的诸般论述，更是基于“女子之能力，当以受教育与否为断”^①的大前提。即使关于女子参政议政问题，所论也与教育密切相关。

金天翻之所以极为重视女子教育权，固然因为此为天赋人权之一，“且权利思想之发达，乃借读书以养成”，特许为“开宗明义之第一着也”。而更重要的是，在金氏看来，教育又不仅有助于女权意识的培植，实在也与国家的强弱息息相关：

教育者，造国民之器械也。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部分，是教育当普及。吾未闻有偏枯之教育，而国不受其病者也。^②

这才是《女界钟》特重教育的关键所在。中国的现实正是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被普遍剥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也早已将国势的日就衰落归咎于此^③，金天翻的说法因此并非创见。其值得称许之处，是以女子教育隶属于国民教育。

这一国民教育首先是与“奴隶教育”相对立。金天翻将中国的教育一言以蔽之曰“奴隶”，而“女子者，奴之奴也，并奴隶之教育而亦不得闻”。由此造成国人尽为“直接之奴隶”与“间接双料之奴隶”，中国亦成为一即将亡国灭种的“奴隶世界”。金氏认为，“奴界不一，要皆自不自尊自立之教育而来”。于是，“救奴隶之方法”便应反其道而行之。而“只教成一自尊自立之人”，恰是英国国民教育自傲于他国教育的特色，与金天翻所指斥的日本女界之“纤靡卑屈”、女子教育之“蔑视女权”适相反对。以此，“游学欧美”便成为《女界钟》指出的中国女性接受教育的最上策，而告诫：“有东游者，但留心于学问、工艺，而无使女界恶风，随元规之尘而污人也。”^④

^① 金一：《女界钟》第二节“女子之道德”、第三节“女子之品性”、第四节“女子之能力”，16、23~32、33页。

^② 金一：《女界钟》第六节“女子之权利”、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61、46页。

^③ 参见梁启超：《论学校六（变法通议三之六）：女学》，载《时务报》，第23、25册，1897年4、5月。

^④ 金一：《女界钟》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第三节“女子之品性”，44~45、32、47、50页。

本着自尊自立的国民教育精神,《女界钟》为晚清女性设置的课程因而与男子相同,分为三个学年,包括国文(文法)、中外历史、中外地理、数学(算术、几何)、理化、英文、唱歌、体操、伦理学、心理学、图画、论理学(即逻辑学)、博物(即自然科学知识)、哲学大意、经济学大意、法律学大意、测绘等。^①此科目安排虽然与金天翻次年所办同里明华女学校的课表有出入,后者“三年毕业”的“普通学科”,“分国文、修身、初级历史、初级地理、初级物理、初级算学、小说、唱歌、体操科”^②教授,但无论如何,二者与其他女学堂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此即金氏已然指明的不设家政课。而其中实具深意。

对于排除家政的疑问,金天翻给出的回答是:“夫家政之为学,单纯而简捷,口讲手画,不三日而毕矣。”这当然指的是他在“女子之道德”中提及的“世俗所谓‘家政’,米盐琐屑”,乃是“狭义”的家政。而金氏心中本有一“广义”的家政在:“吾之所谓‘家政’,自育儿、卫生至于经济、法律、用人、行政,荦荦数大端,隐然如国之雏形。”其意义正在于治家与治国的相通,在治理家政中,亦可训练治理国政的能力。上述课程中与柴米油盐等日常家务无关的各专门学科,因此大有用场:

故吾宁以经济、法律、哲学导其理想,而以理化、测绘致诸实行。若夫伦理者,实含有家政者也;历史、地理、算学者,普通之必要也;心理者,备教育之用也。^③

这自然是极为理想化的设计。即使不切实用,在其三年制的明华女学校教学中亦无法照搬,此说却显示出金天翻以女子的国民教育打破狭隘的家政教育范围的努力。

不过,这种表面上与男子相同的学习科目,其实并未消除性别的区分。所有课程均可归入金天翻所谓“广义”家政学,即为明证。而金氏对于女子的身份,更有“国民之母”的期待。除去与遗传根性相关的“胎教”,对“母仪”的推重也为题中之义。^④同幼儿最为亲近的母亲,

^① 参见金一:《女界钟》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49页。

^② 《明华女学章程》,载《女子世界》,第2期,1904年2月,69页。

^③ 金一:《女界钟》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第二节“女子之道德”,50、19~20页。

^④ 参见金一:《女界钟》第二节“女子之道德”,18~19页。